



- 美国奇案
- 谁把她们送上绝路
- 西雅图百名少女失踪案
- 星条旗下的“魅惑世界”

瞧 西方的万花筒

延边人民出版社

序

耳闻目睹之后写文章，更真实，更可信。本书的作者大都是外国的记者、作家、我国驻外人员或出访人员。他们用真实的故事，翔实的材料，描绘了灯红酒绿的西方花花世界——人世之间的辛酸，欧美社会的丑陋。

以前，有人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月亮圆；现在，有不少人向往西方，羡慕西方。在他们眼里，西方是乐园，是天堂，是富贵荣华的圣地。应该承认，西方欧美社会确实有技术，有美元、英镑，高度发达，令人耳目一新。但真正深入这个社会的深层之中，就会发现这是个病态社会，其毒瘤越长越大，甚至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使多少人为之惊叹。然而，你听说过“乞丐学校”、“扒手训练班”吗？更有甚者的是警娼合污、毒品走私的潜流连绵不断，这一切又与美国的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请读《星条旗下的魍魉世界》，这一强烈的社会反差，将帮助我们全面地认识美国社会。

再说日本。樱花之国——日本，由于经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世人羡慕不已。然而，这一切不尽然。日本的黑社会的抢劫、绑架、凶杀等案件，屡屡发生；色情和卖淫活动，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使

日本正直人士为之忧心忡忡。请读《樱花之国的一个“毒瘤”》。还有人说日本是“民主的国家”、“人间的乐园”，实际上并不这样。所谓的“民主的国家”，实质上是被垄断资产阶级操纵，虚伪的民主掩盖了金钱政治，对劳动人民来说，并无政治权利可言。而“乐园”是属于少数人的，劳动人民却受到“就业、住房、通货膨胀、自杀”等诸多社会问题的困扰。请读《日本，像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这篇文章说明了日本在高度发达的经济背后仍存在着种种弊端。

政治上的黑暗，这是西方社会的一大特色。但西方一些国家一向标榜他们为政清廉，崇尚道德。事实胜于雄辩。近年来政坛上的种种丑闻屡屡披露，揭去他们道貌岸然的假面具，将他们男盗女娼的真实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请读《西方政坛上的丑闻》和《美国当代史上耻辱的一页》。难怪乎，一些西方历史学家、作家把当今西方政坛丑闻称之为“丑闻时代”、“掘粪时期”。

西方社会确实有钱，但钱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很多人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这是西方社会的另一特色。漫步繁华的法国巴黎街头，触目惊心的是行乞者多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乞讨者胸前挂着的牌子上写道：“我失业了”！“没有饭吃”。那呆滞的目光，那可怜的形象，使你的同情心油然而生。请读《巴黎穷人多》。在意大利，有些穷人实在无法生活，只好失去人格，用哭和笑去赚几个钱，请读《哭和笑的买卖》。在《养子的代价》一文中，叙述了一个盛产“养子”的美国妇女为生活所迫，接连不断地怀孕，代人生孩子，用卖掉孩子的苦命钱，维持最贫穷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辛酸苦辣的真实故事。此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却与60年前我国

著名作家柔石写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大有相同之处。

在西方社会，穷苦人家的妇女儿童生活在最底层，被蹂躏，被践踏，生活乃至生命根本没有保障。这与我国的妇女儿童受法律保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白衣杀手》一文中，真实地写了这样一件令人心折骨惊的事：为富不仁的欧美社会，孕育出一批见利忘义的外科大夫，他们身披圣洁的白衣，面带“慈善”的笑容，纷纷涌向第三世界，以卑鄙的手段从那些可怜的贫穷儿童身上窃取活生生的人体器官，然后以高价出售这些人体器官。这些人是一批披着白衣的杀人凶手。在《罗比·韦恩虐杀案》中，美国儿童罗比之死更使人触目惊心。6岁的小罗比随母改嫁，其继父毫无理由地骂他、打他，摧残他，最后小罗比被折磨死了。对于小罗比继父的残无人道的暴行，那个社会竟无人过问，可见黑暗到了极点。社会黑暗了，必然滋生出一批凶手、强奸、抢劫、吸毒等犯罪分子，请读《“野兽”的暴行》、《西雅图百名少女失踪案》；社会黑暗了，必然逼得青年人走投无路，《谁把她们送上绝路》中的三个姑娘，因不堪忍受“工作”上的“污辱”和“损害”，悲惨地离开了人世。

亚洲“四小龙”可谓学西方的样板，经济确实有所起色，但社会的毒瘤却无法解决。《铁蹄下的少女》真实地描绘了海峡两岸姐妹同胞的苦难遭遇。这些少女刚步入豆蔻年华，就横遭风雨，或者说刚涉足社会，就惨遭恶势力的蹂躏，读来凄凉悲切，怎会不令人一掬同情之泪？这是台湾的事。在南朝鲜，也不例外。装神弄鬼的朴顺子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还有其他28人“升天”，这就是《邪教徒集体自杀真相》。

本书还编选了另一组文章，即苏联的克格勃、中国的留

学生、朝鲜的著名演员叛逃西方。这些人向往西方世界，到头来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落得个可悲又可耻的下场。出国留学已成为当代青年人十分钦羡的事，然而她为了“爱情”而丧失了理智，充当了间谍并从事特务活动。当她带上国家安全部的手铐时，她的所谓“爱情”也随之消失，这就是《女间谍的“爱”与毁》。在改革的浪潮中，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人为了满足对金钱的强烈欲望，不惜出卖人格国格，做出了损害民族利益的事来，到头来只能落得个令人可悲又可叹的下场。被国外反动势力收买的女间谍佟珊，何尝不是如此。请读《“燕子”从彼岸飞来》。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只有充分揭露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黑暗，才能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的进步、光明、向上，从而像爱护眼球一样爱护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想，几位编者友人的意图就在这里。

鞠悦来

1991年2月8日

目 录

序

巴黎穷人多	1
星条旗下的“魑魅世界”	14
外交官犯罪纪实	18
西方政坛上的丑闻	21
日本，像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25
美国当代史上耻辱的一页	34
世界四大通缉犯	38
谁把她们送上绝路	42
日本的“隐形离婚”	47
陪嫁谋杀	51
英国皇室婚姻悲欢无常	56
铁蹄下的少女	60
色情风气弥漫这地方	72
西雅图百名少女失踪案	76
“野兽”的暴行	81
轰动巴黎的一起谋杀案	86
谁杀死罗宾斯一家	91
美国奇案	94
日本一起凶杀案的内幕	101
滚开吧，魔鬼	106

罗比·韦恩虐杀案	110
邪教徒集体殉葬真相	117
美国青少年的困惑	120
聪明误	125
一场震惊香港的“超级地震”	130
美国商店的窃贼	135
樱花之国的一个“毒瘤”	137
养子的代价	143
美国的另一面	147
白衣杀手	151
国际贩卖儿童采访记	155
日本人的难处	160
叛逃后的幻灭	162
崔银姬叛逃美国之后	167
“燕子”从彼岸飞来	175
女间谍的“爱”与毁	185
一个年轻人出逃后的忏悔	190
化学杀人案	198
后记	

巴黎穷人多(外五篇)

漫步繁华的巴黎街头，触目惊心的是行乞者多到了难以让人置信的地步。他们基本上集中分布于闹市地区，在偏僻的地方，也偶尔有人会向你要两个法郎买个面包什么的。在各个市场、地铁车站的过道等处，乞讨的行人席地而坐，低下脑袋，胸前的牌子上写道：“我失业了”、“没有饭吃”。有的则拿着帽子或铁罐，用呆滞的目光望着过路人，使你的同情心油然而生。

时间长了，你还会发现，地铁车站和列车中，养活了一大批音乐家。这些车站音乐家喜欢占据连通两条线路的地下通道，在很远的地方，你就可听到悠扬的乐声，然后看见乐师在演奏，歌唱家在放歌。他们的身边散落着一把硬币，还在等待你也掏出一二，以表示对艺术的热爱。与这些称为“固定音乐家”略有区别的，是“流动音乐家”。地铁车经过车站时，往往会上来三、四人，吹拉弹唱，恰到好处地抓住列车行驶一站所需的几分钟进行表演。一曲终了，一位乐师会在车箱里巡回一遍，募集维持生计的硬币。然后，乐队下车，等待下一部车的到来，继续他们的辛劳。这些穷人算不得行乞，只是利用一种艺技作为谋生手段，但又多么不同于我们在舞台上、电视里所见的音乐家。

还有一类穷人的主动服务。在繁忙的十字路口，等红灯亮起，你的汽车停下时，说不定会飞快地钻出一位少年，一下子将你的挡风玻璃擦得干干净净。当然，你不好不为此付出报酬，以表示对劳动的尊重。

1984年冬，一阵寒流袭过后，巴黎的街头留下若干流浪汉的尸骨。另外，还有舍不得使用暖气的靠养老金为生的老年人在床上冻死。富裕国家还有穷到抵抗不住寒流侵袭的穷人！社会舆论大哗。调

查之后，发现慈善机构早已施汤舍饭，但任务繁重，实在难以应付。于是，市政府决定扩大收容无家可归者的场所，几个地铁站通宵开门，使流浪汉得以避风御寒。

穷人的大量增多，是与近几年来失业率的不断增高分不开的。法国现有250万左右的失业者，占劳动人口的十分之一；而青年人中，失业者竟达四分之一，处境更为严重。法国新政府上台后，声称要把解决失业问题放在首位，舆论认为这是衡量新政府成败的关键。

二次大战后，法国与西方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经历了20年经济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建立起一个物质基础丰富的“福利国家”，但7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停滞，通货膨胀，虽然政府采取了各种扭转局势的措施，但成效总是不甚明显。从巴黎日益增多的穷困人员身上，就可大致窥见当今法国社会的缩影。

(高凌翰)

猖獗的人口贩卖活动

进入20世纪80年代，贩卖人口的勾当在世界许多地方越来越盛行，每年估计约有数百万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儿童和妇女被贩运到世界各地，而且这一行业又愈来愈国际化、专业化。

买卖儿童最严重的是在亚洲地区，每天约有数以千计的婴儿被出卖，价格则依买主心情和出售婴儿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定。

在印度，每天至少有6个新生儿从加尔各答的贫民区或新德里的妇产医院被运到外国供人领养。1985年，印度曾有人对设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一个领养孩子机构参与这种贩运婴儿的营生提出过强烈抗议。黎巴嫩因连年遭受兵燹之灾，有人登的一则广告说，他有8个未成年的孩子可以卖出，代价是买主把这些孩子带出黎巴嫩，使他们过上起码的生活。泰国和斯里兰卡的婴儿价格很便宜，一个只要几百美元，但一旦把他们带到欧美，就身价百倍，在西德可以换成2.5万美元以上。西德救济机构“人类之家”报告说，每年有1 000多名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儿童被西德无子女夫妇收养去，其中一半以上是通过没有认可

的机构运到西德的，主要是一些专门从事秘密收养儿童机构进行偷运。

孟加拉国由于社会动荡，天灾人祸不断，许多人拖家带口地拥进大城市，为了生活，只好卖儿鬻女，这也给人口贩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达卡的官员承认，有些儿童甚至被贩卖给乞丐集团，受到的虐待更是令人发指，乞丐头子为了得到更多的钱，把儿童的手脚弄残，以便博得同情和怜悯。

拐婴事件在美国也时有所闻，1987年6月，马里兰州的一家医院里，一位出生3周的婴儿被人抱走。一周后，巴尔的摩的霍普金斯医院里，一个刚出生两天的男婴也突然失踪。据统计，在过去二年半里，有10个婴儿在医院里被人拐走。

人贩子除了拐卖儿童供人抚养之外，更多地是把他们投入陷阱，作为性的奴隶。当艾滋病和其它传染性性病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时，有些人就转回寻找小男孩或小女孩作为性的玩物。据美国《新闻周刊》不久前报道，在美国，有数以万计的儿童(包括男孩和女孩)在干着童妓的营生。在洛杉矶的市郊中学区，如圣费尔南多谷，可以从传唤服务社召来一个12岁的女孩。

据一份送给国际民主律师协会的报告指出，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由于许多富裕的阿拉伯人前来旅游，以致供他们玩弄的儿童供不应求。澳大利亚的黑手党见有利可图，于是插手介入，并且已控制了为阿拉伯人、欧、澳、美顾客供应雏妓的行业。更令人发指的是，在菲律宾一些为旅客而设的高级娼妓中心，竟有4—6岁的幼童成为招募对象。

这份报告书还指出，在马尼拉有一个非法组织，则专门招募年轻女子，将她们送往新加坡、吉隆坡或东京、欧美，转给妓院。报告书说，有18名年龄在10—17岁的少女在马尼拉被发现时，她们的右臂都有相同的纹身标记。

在泰国，引诱儿童卖淫的行为较为谨慎，那些雏妓都被关在一些特别的妓院内而不准外出，因而受到警察当局的某些容忍。据送给国际民主律师协会的报告说，仅在泰国就有2万多名15岁以下的儿童成

为卖淫集团的受害人。此外，在泰国要将儿童贩运出境毫无困难，这些儿童出境后，会直接送往南朝鲜、日本、香港或较近国家的妓院当娼，而他们多数是以私人的“雇员”身份出外“旅游”。

据报道，不久前美国联邦当局还查获亚洲的两个犯罪组织——“竹联邦”和“万青邦”在美国进行性犯罪的活动。他们把许多亚洲妇女拐骗到美国，使她们落入陷阱。在工业城市底特律郊区，地方当局发现了由南朝鲜犯罪组织经营的5个“疗养院”。同时，他们还发现这些疗养院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大约有数千名亚洲妇女在里面充当妓女。在加利福尼亚南部，一个南朝鲜的犯罪集团经营着150多家“按摩院”，在这些变相的妓院里，从亚洲拐去的妇女经受难以言状的痛苦。洛杉矶县的司法长纳特森说：“经营这些妓院的是一些亚洲的地下犯罪组织，他们相互串通，暗中勾结，把大批亚洲妇女推入深渊。”他还揭露说，犯罪组织把这些女孩子当作物品一样交换，在这个按摩院的女郎不久又在另一个地方露面了。警察还在纽约、旧金山查获一批由台湾组织经营的这种妓院。

(赵绍禧)

哭和笑的买卖

在意大利南部加坦萨罗城的一条小街上，一列不太长的送葬队伍，缓慢地向街的另一头移动着。一位身着黑色丧服的中年妇女，走在棺材的后面，在两人的搀扶下，哭得死去活来。她忽儿捶胸顿足，忽儿扑向棺材，嘴里不时地大声喊着：“天哪，你就这样忍心抛下我！”那喊声、惨景，令人心碎肠断。

两小时后，这位中年妇女，却换上了华丽的礼服，出现在另一条街的一户办喜事人家的客厅里。此刻，她满面春风，笑声满屋，不时地向前来给新郎新娘祝贺的宾客们微笑、点头、握手。

上面写的这两小段，一非小说的节录；二非电影中的镜头，而是资本主义世界里，一位从事“眼泪与笑声”的买卖人的生意片断。

这位中年妇女，名叫玛莉亚格拉茜太太，41岁，经营这门生意已

是一位老手了。她之所以选择了这个“七十二行”以外的职业，主要是因生活所迫。有一次，一位好奇的英国记者米路士好不容易找到了她，读者可以从他们两人之间的谈话，了解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你第一次做这样的生意……”记者米路士感到有些不妥，立刻改口道，“哦，请原谅，太太，你第一次做这样的工作是怎样开始的？”

“没关系的，记者先生，我就是在做这种生意啊，说工作，那只不过是好听一点，文雅一些罢了。”玛莉亚格拉茜太太毫不介意的说道。她从一只皮箱里，取出一份旧得发黄的报纸，指着右下角的一个地方说：“呶，你瞧瞧，这是10年前的事情了，我就是这样开始的。”

米路士接过报纸一看，原来是一幅广告，上写着：“君若需要‘眼泪与笑声’的话，本人可以出卖。需要者，可来西西里岛的卡坦尼亚镇与本人面商。”广告的最后一行，还用异体字写道：“哭与笑的气氛浓厚，效果甚佳，价钱公道，包君如意！”记者看后，耸了耸两肩说：“真没想到你是这样开始的。”米路士停了一下，好像又想起了什么，急忙追问了一句：“这是你的发明吗？太太。”

“不，先生。说实在的，我也是学别人的。如果非要说发明的话，登这样的广告，在意大利我算是第一个。”

“这么说，干你这一行的人还有？”

“那当然，据我所知，在意大利干我这一行的，不下一千人啊！”

“多少钱一回呢？”

“哭和笑都一样，每次收费12美元。你说贵吗？先生。”

“不贵，不贵，太太，仅这点钱，是不够补偿哭或笑一回消耗的体力的。”

这两人谈了一阵之后，记者米路士开始注意她的会客室，虽然不大，但陈设十分考究。“看来，你现在很有钱。”米路士再次打开话匣：“那么，你每周哭和笑的次数肯定是不会少的。”

“那当然，少则10次，多则20次以上。有时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前一小时哭，紧接着是后一小时的笑，连气都喘不过来。”

“这样受得了吗？”

“开始不行，一次哭下来，几天吃不下饭，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不过，没关系的，因为我过去很穷，常生病无钱求医，像这样难受的日子，我过惯了。后来，日子一久，也就更无所谓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花钱雇你？”

“这个么——”她想了一想，“那些大经理、大老板来雇我们，是花几个钱来买我的眼泪和笑声，再用我们哭或笑去为他们赚大钱。”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太太。”

玛莉亚格拉茜沉思片刻后，给米路士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位78岁的银行家娶了一个26岁的妻子。这狠心的妻子为了及早得到那笔价值百万美元的家产，竟花钱雇了一名职业杀人者制造了一次车祸。那位银行家葬身车轮之下，他那狠心的妻子却高兴万分，但做贼心虚，这位贵妇为了掩盖她那不致被亲友们怀疑的害人之心，不得不当众大哭几场，但她又哭不出来，好在这里有雇人来哭的习惯，于是，便把玛莉亚格拉茜太太叫去。太太也确实行，哭声一起，口水鼻涕一流，真的感染了不少人，就连那位狠毒的贵妇，也流下了不少眼泪。

玛莉亚格拉茜讲完这件事后，对米路士说：“你明白了吧，记者先生，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花钱来买我的眼泪和哭声的秘密。其实，那次我得到的，仍是12美元，而她呢，却成了一位百万富妇！”

“至于我们这些人，”太太接着说，“因为每天要时哭时笑，不仅使嗓子、心、肺会受到损伤，积劳成疾，更可怕的是为了要哭笑得真，好叫人雇你，就得像演员进入角色一样，得真哭真笑，天长日久，像这样被导致患精神病者，在我的同行中，已经10多人了！”

（陈然）

人生的悲剧

香港这个花花世界，无奇不有。我在这里居留不到3个月，就看见和听到不少稀奇古怪的事。

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冬天，我偶感风寒，身体略有不适，表姐

陪我上医院就诊，我们来到玛嘉烈医院，看见一个身材魁伟的男子，穿着白色上衣和深色女西服裙，正在和医院执事人员争吵。这种不男不女的装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表姐出于记者的职业敏感，上前问讯缘由。一问，使我大吃一惊，万万想不到天下真有如此怪事。那位身材高大的男子汉说，她叫张佩珍，原为港府初级打字文员。去年初冬，他到这家医院做了性变手术。手术前他叫张锦荣，手术后由男性变为女性，换了身份证，改名张佩珍。但是，这次手术并未成功。担任手术主刀的是一位矫形外科医生，做的所谓“性变手术”，只是将他的性器官外形改观，最终结果是男不男，女不女。

张锦荣说，这次“性变手术”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今天他来找玛嘉烈医院求治，医院只给他几粒止痛药。医院执事声称：这次性变手术，是按求诊者本人要求作的。手术之前，院方曾劝其三思，指出像他这么大的年纪做性变手术难免留下后遗症，但求诊者自愿要作；因此院方对此事不负责任云云。

听见这番各执一词的荒唐争吵，令人感到啼笑皆非。表姐认为碰到了“独家新闻”，立即抓着张佩珍不放，进行挖根刨底采访，问他为什么要将男子汉变成女儿身？张佩珍倾吐了满腹苦水。她说：“小时候我家里很穷，读书成绩不好。爸爸骂我蠢，常常毒打我。我看见爸爸就吓得发抖。为了节省学费，爸爸送我到洋服店当学徒。我天天工作就是洗痰盂、扫地、拖地板、洗布、晾布和跑街买东西。每天工作长达20小时。学徒又没有工资，一双木屐磨穿了后跟。在街上看见同学我赶忙躲开，自卑得很。

“经过三年学徒和两年帮师，我没有学得一技之长，最拿手的本领是擦痰盂。我觉得自己太卑贱，无本事，无志气，也没有胆量。根本不敢做一个男人，成家娶妻、养仔……家里的人都看不起我。妈妈骂我说，‘你怎么不变女仔呀！女仔可以嫁人了事，有条出路……’”

“啊，原来做女仔就不会被人骂作无用了！做女仔就有人养活了？我没有本事，厌恶当男人。其实，我很早就开始扮过女仔。我看见后母疼女仔，觉得女仔很娇贵，便偷着姐姐的衣服来穿。穿上女装一照镜，也觉得自己有几分靓，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忘却了被爸爸打

骂的冤屈，和被家里人歧视的痛苦了，扮女人好快乐呀。

“二哥见我洋服店学徒生涯无出路，就供给我上了两年英文夜校。同时又在家中练习打字。学到一点本事，终于考得了一个政府初级文员的职位，工作至今20多年。

“我在写字楼里上班，始终觉得上帝没有赐予我做男人的权利。日间生活很苦闷，唯一享受便是下班后回家穿上女装。我穿上女装后一切不惬意的事立刻烟消云散，心里非常舒坦。有时，我甚至装扮成女人上街。心理医生劝我只须在心里幻想自己是女性就行了，不要穿着女装。我觉得只有实实在在穿上女人服装，才能达到忘我境界，才能过瘾……

“因为我时常男扮女装，招来了写字楼里同事们的非议。一天，我的上司召见我垂询此事，并指责牛高马大的男人以女装亮相，未免有失政府公务员的体面。这就逼得我无路可走罗！不得不横下一条心，到矫形医院做了性变手术，改名张佩珍，理直气壮穿上女装。”

我问张佩珍，做了性变手术之后，心头是怎样一番滋味？

她说：“当然，我能如愿以偿，名正言顺地穿上女装，再也没有男扮女的罪恶感了。但是，到了发月薪时，才发觉他们仍然扣我孤儿寡妇金。这孤儿寡妇金只有男人才扣嘛！我做性变手术后改了名字，调了新部门，又换了新身份证，明明是女人了嘛，没有义务继续供款。所以我写信申请退还所扣的寡妇金，并希望以后停扣。但他们不答应，说这是根据出世纸的性别定的。我吃了那么多苦才变成女人，他们仍然不接受这个事实。难道出世纸的性别项目是不能改变的吗？”

当结束采访时，问张佩珍对其不成功的性变手术有无悔意，她却说：

“我毫无悔意。我已不是男人了，也不全是女人。我不必担当男人娶妻养家的责任，亦不要守女人天职。我没有男儿志向，也没有女儿心事。啊哈，我没有性别界限，可以飘飘浮浮，游戏人间，但说实在的，更多的时候，却觉得失去本性，整个人生迷迷惘惘……”

（邓燕）

被阉割的流浪者

拉津德·库马尔原来是个裁缝。但是1986年12月10日他结束了裁缝生涯，加入了社会流浪者的行列，开始四处漂泊。原来那天晚上，他到德里东区几位流浪者的住处去看望他们。这些流浪者都是被阉割过的男人，他们打扮成女人的样子，从事祈神赐福的职业。一听到哪家有孩子降生，他们便去为孩子祈福，然后收取报酬。库马尔把这些流浪者视为好友，希望从他们那里学到击鼓的技艺。然而他们却把他灌得烂醉，趁他不省人事时将他阉割了。

库马尔整整卧床两个月，不能动弹。伤口痊愈之后，流浪者强迫他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给他全身上下换上女装，带他到他们的乞讨地盘去行乞。7个月后，库马尔逃了出来，聘请律师打官司，警察把这几名流浪者抓了起来，但他们又被保释了。这个案子至今仍搁在印度法院里，未作出裁决。为此，库马尔的妻子闹着和他离婚，他的孩子也不愿来看他，他心灰意冷，绝望地说：“我的生命结束了。”

类似库马尔这样的故事在印度时常可见诸报端，因此，大多数印度人对流浪者都怀有畏惧之心，谈虎色变。不过，头脑较传统的人对流浪者们并没有那么害怕，因为他们尊敬流浪者的宗教威力。有些人举办婚礼时甚至雇请他们来唱歌跳舞，增添气氛。

多年来流浪者一直被学者们所忽视。但现在大量涌现的现象表明，把他们视作社会毒瘤是错误的。在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里，一些性欲倒错者和性错乱的男人是被迫走上这条道路的。

流浪者的历史迄今仍是个谜，虽然在《神的箴言集》、《摩呵婆罗多》和其他梵文著作中有过关于这些流浪者的记载，认为他们的出现早于莫卧儿时期充当后宫妻妾的“太监”。

由于流浪者的秘密性和他们对外界的敌视，他们在一般人中的形象只是一伙匪帮而已。他们大部分都群居，从5人到20人不等，每群都有一名高级流浪者或头头。这个头头集宗教导师、“岳母”和帮首领地位于一身，对其成员有绝对的控制权，甚至有权决定其成员可以跟

谁说话。在新德里和孟买这样的大城市里，人们受教育的程度较高，不轻易屈从于流浪者祝福乞钱的要求，因此，不少被阉割者只能卖身求生，沦为同性恋男妓。

一方面出于对公众害怕心理的反应，一方面出于改善流浪者生活条件的考虑，1983年波拉发起成立了“全印流浪者福利会”。现在波拉在新德里法庭里有3起案件(包括库马尔的)等待处理，这些案件都是指控流浪者的，尤其是指控他们实行强迫阉割。

1983年德里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对德里89名流浪者进行了调查，其中16人说他们是被强迫加入流浪者行列的，其余60人说他们相信自己具有女性特征，或者从小时候就对妇女衣着和妇女活动有不同寻常的兴趣。许多人说他们的家庭以粗暴态度对待他们，他们第一次跑到被阉割者那里去时是为了寻求支持和温暖。

美国人类学家塞雷纳·南达说这些流浪者的构成范围很广，“从真正的性欲倒错者到女里女气的同性恋者，到以挣钱为主要动机的人”。流浪者的传统职业是在婚礼上唱歌跳舞，为婴儿祈神祝福，这类工作对许多人来说，比做仆人更有吸引力。

南达同时也指出，许多复杂的社会、经济和心理压力驱使一些男人走上这条路。大多数流浪者都宣称自己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独居在德里一个贫民区的30岁的流浪者萨马却不一样，他把自己称作女人。童年时他就和流浪者来往密切，那些流浪者立刻判定他和他们是一路的，于是对他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说服他入伙，进行了阉割。

但两年之后，他离开了他们，因为其他帮派要他去充当同性恋娼妓，以增加他们的收入。现在他另立一帮充当头头，控制着4个流浪者，而且和他的家庭又建立了联系，还在节日期间定期去看望他们。

萨马说：“通常我每月挣2 000卢比，我还拥有一台电视机。我喜欢打扮。我穿上漂亮衣服，涂脂抹粉时，非常漂亮。”但他也承认：“每当我想到阉割时的情景，我就痛苦得要死。一个人不能把时间都用来想这样的问题。”

(吴超莹编译)